清史研究集

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清史研究集

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史研究集

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2.5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329,000　册数：5,300
统一书号：11011·94　定价：1.15元

目　录

编者的话……（1）
清史研究笔谈
爱惜人才的呼吁……黎　澍（3）
科研杂感……严中平（5）
对清前期历史必须作综合比较研究……王钟翰（13）
对研究清史的一点意见……李　侃（16）
清史研究工作简谈……商鸿逵（20）
考察清代历史的几点浅见……郑昌淦（23）
谈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戴　逸（27）

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王思治（31）
雍正评议……林毓辉　史　松（61）
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刘永成（91）
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喻松青（113）
试论天地会……秦宝琦　刘美珍（154）
第巴·桑结嘉错杂考……王　尧（183）
论杜尔伯特三车凌维护国家统一的
斗争……马汝珩　马大正（200）
关于宣南诗社的几个问题……王俊义（216）
十六至十七世纪沙皇政府的侵华活动……许淑明（243）
海约翰提出第一个对华门户开放通牒原因
初探……卿斯美（269）

试论“民报”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和
经济思想……罗　明(303)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法制的批判……文　海(330)
清代杰出的治河专家——陈潢……李鸿彬(349)
颐和园历史考辨……王道成(359)

译文：鞑靼漂流记……长　鸾译　薛　虹校注(37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编 者 的 话

《清史研究集》是学术性的专题论文汇编，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辑。本刊既反映我所科研成果，也欢迎外稿。我们希望，在广大清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关心和扶植下，这个小小的园地，能够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尽一点绵薄之力。

有清一代，以一八四〇年为界，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从一六四四年满族统治者入关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是前期的清代史；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二年清帝逊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代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畴。清史研究的范围，当然应该包括清封建王朝自建立以迄复亡的全部历史过程。因此，《清史研究集》将既刊登鸦片战争以前、也刊登鸦片战争以后的清史论著。由于前一个历史阶段所占时间较长，所以本刊也将以较多的篇幅反映前期清史（包括入关前）研究中的学术问题。

清代历史尤其是前期清史，问题十分庞杂，资料极其浩繁，前人留下的研究成果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对清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近年来，发表了为数不少，有相当学术价值的清史论文。史学界对清史的研究日益重视，使我们深受鼓舞。但是，相对说来，对清史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许多问题尚待深入探讨，不少领域还需要人们去开拓，任重而道远。本来，科学工作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探索未知，对于那些已知的社会历史现象，也需要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说明。这是一项艰辛的社会劳动。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

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科学的道路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次就穷尽真理，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历史科学当然也是如此。鉴于清史研究面临的艰巨任务，更需要大家通力合作，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互相切磋。因此，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显得更加重要。任何一种学术观点，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确实是建筑在对大量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的，我们都表示欢迎，并尽量陆续发表。凡在本刊发表的文章，只是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任何单位，也不代表本刊编辑组。

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他们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给历史科学设置了许多“禁区”，也给人们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创伤，扼杀了科学的创新精神。然而，在研究工作中，所需要的是既要有坚毅不拔、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同时也需要有脚踏实地大呼猛进的闯将。今天，“四人帮”已经作为千古罪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科学的春天业已来临，因此，我们尤其希望能有敢于阐述自己的观点，旗帜鲜明，能够启迪人们思想的文章在本刊发表。

历史本身是丰富生动、多彩多姿的，反映客观历史的研究论文，也应该力求鲜明、生动、准确。广大读者厌憎透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那种装腔作势、空话连篇、曲折隐晦、干瘪无味的腐朽文风，在文风问题上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恢复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良传统，是广大读者和作者的迫切心愿。在这方面，本刊愿与作者们共同努力。

在第一辑编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史学界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我们谨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编辑工作一定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我们也恳切地希望读者们多提批评和意见。

清史研究笔谈

爱惜人才的呼吁

——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
清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黎　澍

向清史学术讨论会致以热烈的祝贺！我现在想利用这个机会，讲点略有关系的感想，呼吁爱惜人才。

在经过长时间的大破坏以后，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人才危机。特别是社会科学缺乏人才。许多博学的老专家被折磨死了。没有死的，有不少已经失去工作能力。还能工作的人，年岁也大了。六十年代离开大学的青年，多数是反“白专道路”的受害者。他们在学校学得不好。有很多人不懂古汉语。很少人懂外语，荒疏多年，也丢了。现在年已四十上下，不小了。我们的社会风尚向来不爱惜人才。爱才被视为罪恶。重才与轻德似乎是相联系而又相对立的，重才必定轻德，致使自以为“有德”之人为之愤愤不平。往往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带着他的无可避免的缺点出现了，群起攻之，有理无理整得他不再露面，然后不知所终。反右派斗争伤害了大量聪明才智之士，而且一经戴上“右派”帽子就被认定是永远不齿于人类的了。摘了帽子还叫“摘帽右派”。这几年平反了，又叫“改正右派”。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场浩劫，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沿不用说，对人才也是一次大扫荡。到处可以听到一些才华出

众的青年被杀害了。张志新是举世皆知，死得特别壮烈的一个。北京有个遇罗克，年纪二十六、七岁，因为写文章批评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枪毙了。还有多处听说在一九七五——七六年因为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枪毙的。在林彪、“四人帮”统治的整个时期，兽性随着专制主义的残暴而大发，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滥扑滥杀成了满不在乎的事。学校教育水平低下，学生成了随时听候驱使的政治工具，没有人关心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人才来。所以现在我们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人才危机。迫切需要有新生力量的补充。可是缺乏来源，一时很难补充起来。

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生不满百，可是要百年才树得起来，可见其难。现在我们应当深刻地懂得爱惜人才的重要性，不再随便糟踏了。

举办学术讨论会是培养青年，让他们出头露面的好办法。应当经常举行。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到现在才开过两次学术讨论会，太少了。不妨每年开两次。规模小些，简便一些，说开就开。青年应当利用这种机会使自己受到锻炼，老专家应当利用这种机会发现人才，帮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敬祝讨论会成功！

科研杂感

严中平

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经济研究所的十来个同志，组成一个小组，承担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任务。在五十年代，我们陆续出版了几个经济部门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基本上都从鸦片战争时期编起，题目虽然都叫做中国近代某某部门史资料，实际上都没有编到建国前夕，有的只到甲午战争为止。所谓“近代”，只是半截子而已。

到了五十年代末，我们被当时史学界争论问题的热烈气氛所感染，也开始做些专题研究。但不久，上级便要求我们编写中国近代经济通史教材。实践的结果是，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今天我们仍然为编写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经济通史这本专门著作工作着。

不过，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心中惶惑，深感难以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过去所接触的资料，只限于几个经济部门，说不上国民经济全貌，而且是因为我们连自己所编的资料，也还没有很好地全面消化；至于为研究这段经济史所必须有所了解的其他方面，那就更加情况不明，心中无数了。

我们的经历，显示出一个问题：领导科研工作，需要有长远规划，为发展一门科学，要全面地、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部署力量，把重要的分枝方面配齐，否则，留下空白是不利的。

我们这十来个人，多数都是在旧中国学习资产阶级经济学出身的，受过史学训练的极少，受过经济史专业训练的一个也没有。此外，我们对马列主义，尤其一窍不通。我们搞经济史这一行，可以

说是逼上梁山的。不过我们的经验倒也表明，在严重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人材时，抓几个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系或历史学系的毕业生来充数，边干边学，是可行的。重要的是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而要从积累资料做起，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专门著作。我们认为，我们走过的这条科研路子是正确的。虽然我们这样做，并不自觉，完全是偶然碰上的。

为了给我们走过的这条路子作辩护，这里有必要说说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当然，我们对自己路子的估价，是自以为是的，我们对认识秩序的理解也可能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中引伸出自己的观点来。要知道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就要进行调查研究，“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① 恩格斯也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②

由此可见，积累资料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舍此谈不上科学研究。二十多年来，有些单位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距对中国近代经济史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还相差太远太远。当前资料饥荒仍然是阻碍这项研究向前发展的瓶子口，是必须大力去抓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

积累资料，一开始就要解决从何着手的问题。这涉及到人类的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过，“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总是由认识个

---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① 这里说的是，从个别事物到诸多事物的认识秩序。

毛泽东同志又说，“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② 而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就是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局部，不看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里说的是从矛盾个别方面到矛盾各方面的认识秩序。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③ 这里说的是，从个别发展阶段到发展全程的认识秩序。

毛泽东同志在具体论到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步骤时指出，“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④ 这里说的是从分析性研究到综合性研究的认识秩序。

以上这些，都说的是“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所谓“正常秩序”，就是人类认识真理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这是一定的、毫无疑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谁不按这个规律办事，谁就要吃苦头。

由个别事物的个别方面和各个发展阶段的分析性研究发展到诸多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发展全程的综合性的研究，不仅是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也是青年科研工作者研究能力成长提高的“正常秩序”。大致可以这样说，越是研究较多事物，较多方面和较长历史的题课，就越是需要较多方面的基本训练和较为广博的知识积

---

①② 毛泽东：《矛盾论》。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1页。

④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累；越是探索普遍意义较为广泛的，即抽象概括的层次较高的一般规律，就越是需要较高层次的从事抽象概括的理论修养和更加熟练的驾驭资料的经验积累。对于青年来说，从前一条路子走起，显然更加合适些。简单说，这就是从小处着手。

个别和诸多、片面和全面、阶段和全程、分析和综合、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都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矛盾着的两个侧面。这几个矛盾的两个侧面，都是相对的。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对于其所包含的诸多组成事物而言是综合性的研究，对于比这个研究课题的范围更广，抽象概括的层次更高的课题而言，却又是分析性的研究。例如，中国近百年经济史这一课题，对于各部门经济史而言，是综合性的研究，对中国近百年通史而言，却又是分析性的研究。不仅如此，对于不同的科研工作者而言，也是相对的。具有较高理论修养、更多研究经验和更加广泛的知识积累的老专家，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综合性课题，初出茅庐的青年总还是以选择分析性的研究为宜。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青中年如果从事教学工作，一般都担负综合性通史任务。他们当然只能依靠别人综合性研究成果去完成任务。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要提高教学质量，那仍非吸收别人分析性研究成果或自己从事分析性研究不可。

分析性研究和综合性研究所已经到达的广度和深度，便是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所已经到达的水平，也是这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科学研究工作所由此出发的起点。

前面我们肯定从小处着手的研究路子。但在此同时，我们不曾从大处着眼。因此，我们虽然搜集了相当大量的历史资料，却掉到琐碎的资料堆里，提不起，放不下，看不远，钻不深，眼界狭小，鼠目寸光，不善于用更高的理论原则去驾驭资料，正确地总结出历史规律来。更加严重的是，一个人以某种学风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就很自然地形成一种个人的治学传统。这种传统，非常顽固，非常难以扭转。如果说，我们这二十多年的工作，有什么值得青年引以为诫的失败教训的话，那就是鼠目寸光而又顽固不化这一条。

这是我们跌了大跤，至今还在吃苦头的地方，希望青年小心避免。

我们鼠目寸光，而又顽固不化的治学传统，具体表现在我们“三就主义”的学风上。我们狭义地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对象范围，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一句话，就事论事。为行文方便起见，让我先从就近代论近代说起。

我们过去编资料、做专题，把注意力集中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上，对于鸦片战争以前的，例如清代前期的历史，注意得不够。这种治学态度，一般地说，乃是割断历史的思想方法，特殊地说，尤其脱离实际。须知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国家。这个半封建的经济结构是不可能就半拉子封建本身去研究清楚的，必须就整个儿封建结构去研究半封建结构。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不仅要研究中国的今天，还要研究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说的是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才能了解中国的今天。恩格斯也指出过，为了全面地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光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在它之前存在过的或者在发展较差的国度内和它同时的那些形式，至少对其主要特征加以研究，予以比较。”① 所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以前存在过的那些形式，当然就是指封建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典范，这里是不须多说的。

就经济论经济，就是忽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种思想方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就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尤其要不得。

在爆发鸦片战争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只有英国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到达成熟阶段，其他国家都比英国落后。但是，在那以后的一百多年里，世界所有独立国家都已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有些还远远超越了英国。在此同时，世界上所有的殖民地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4页。

和半殖民地，都还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这是用就经济论经济的观点所能说明得了的吗？

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予西方侵略势力以各种特权。帝国主义辩护士把这种破坏中国主权的侵略勾当叫做“打开中国大门”；把西方商品在这各种特权保护之下侵入中国市场叫做“自由贸易”。但是，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在一八六九年苏彝士运河的通航和一八七一年海底电线通到中国以前，就连在产业革命中走在最前列的英国棉纺织工业，也谈不上依靠棉纱布的低廉价格大规模地全面地泛滥中国市场。

马克思在论及商业对落后国家旧生产方式的破坏作用时指出，“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有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①

马克思锐利地观察到工农结合的小农经济对外来廉价商品的顽强抵抗力。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已经为我们近代史工作者所普遍接受。大家都用工农结合的小农经济来说明中国小农经济解体过程的缓慢性。马克思所说英国在印度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说的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直接统治权力。但是，西方侵略势力在中国半殖民地间接统治权力是否对西方的经济势力起过“帮助”作用呢？

在十九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这个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西方各国对中国的经济关系，根本不是什么“自由贸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关系，而是彻头彻尾的殖民地暴力掳掠。简单举几个事例罢。不平等条约只许西方各国到中国特定的五个所谓"条约口岸"进行贸易，但他们的商船随心所欲地闯到他们所愿意闯到的任何地方去，以武力对抗中国的查缉。条约规定外商必须缴纳进出口关税和船钞，但他们在领事的包庇之下，猖狂偷税漏税，愿缴多少，就缴多少。条约没有给予任何人以贩卖鸦片的权利，但他们把鸦片囤船长期驻泊到吴松。条约没有给予任何人以掠卖中国人口的权利，但他们公然就在领事馆的隔壁开设所谓"猪仔馆"，囚禁掳来的中国"苦力"。条约没有给予任何人在中国土地上开设工厂的权利，但他们想在哪里设厂，就在哪里设厂。条约许可外人可以在口岸近郊进行游览观光，他们就成群结队地携带猎枪闯到农村去"郊游"，但他们酷爱走进农民的果园，所见以青年妇女为最多，而他们的枪口则又常常对准小猪、母鸡，乃至老人、儿童，弹无虚发。他们如此这般的海盗行径，可以写成大书，但人们对此很少兴趣，热中的只是所谓外国商品如何价廉物美云云。

五十年代，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说，"来自各国的这群外国人，生性卑贱，无有效之管事，为全中国所之后命，亦为全中国的祸患。他们放纵强暴，乃是欧洲各国人的渣滓。"但是欧洲各国渣滓之尤，首先就是英国人。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英国驻上海领事罗伯茨向英国政府报告这一年他经手处理的上海英国人所犯刑事罪行案件，计杀人、绑票、行凶杀人、强奸妇女等等共五百〇三件。而在这不是一年的时间内，长驻上海以及到沪后随即离去的英国人只有六百三十人。以六百三十人而犯下了五百〇三件刑事罪行。上海是一个什么世界呀！

一八五三年，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初到上海一眼就看到"大不列颠的东方征服行动，既不畏惧冥冥苍天，又不顾及人间正义"。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如此猖狂呢？一八六一年英国驻华公使人鲁斯道出了其中秘密，"中国人〔按指清政府官员〕现在的态度是，在任何情况下，连碰都不敢碰到外国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近代中西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在这次战争中，西方侵略势力把清王朝统治集团狠狠地痛揍了一顿，连这个王朝的总头目咸丰皇帝也吓破了狗胆，夹起尾巴逃到热何去了。他们把那座象征中国封建帝王穷侈极欲到顶点、集中西园林艺术之大成的圆明园，抢光烧光。以此来警告清王朝统治集团，谁要敢于对西方侵略势力说一个不字，他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沙皇不费一兵一卒就割去了中国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是，战争一过，西方侵略势力便用武力把这个王朝从起义农民的烈火中拯救出来，并撤走战时占领中国领土的军队。这就告诉清王朝统治集团，西方侵略势力是愿意同它合作，用全力保住清王朝的皇帝宝座的。皇帝宝座这是清王朝统治集团的命根子。此举使清王朝的洋务派头子奕䜣赌咒发誓地投到西方侵略势力的怀抱里去，并借他们的支持，夺得了清王朝最高决策人的地位。西方侵略势力就用这种一打一拉的策略，把清王朝统治集团驯化成彻头彻尾的奴才。如果说，在这次战争以前，清政府官员在任何情况下，是连碰都不敢碰到外国人的，那么在这次战争以后，他们就远望到外国人的影子也要下跪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历代反动政府在历史上只起两种作用，一面是充当镇压起义人民的刽子手，一面是充当西方侵略势力的急先锋。从荣禄和慈禧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到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一贯如此。在这长达九十年的慢长岁月里，中国反动政府的重大决策，没有一件不是仰承洋大人的旨意决定的。中国经济无时无刻不是在这种中外联合的政治经济统治之下演变的。脱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永远说不清楚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在论及从经济基础去说明上层建筑的论断中还曾指出，"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所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